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编

RESEARCH
ON JIN-MERCHANT

晋商研究

2008年第1辑 总第1辑

- ☐ 孔祥毅
晋商商帮溯源
- ☐ 黄鉴晖
会馆是商会的雏形
- ☐ 崔满红等
开中制与明代晋商崛起研究
- ☐ 阎应福
大德通票号的经营管理思想探讨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编

RESEARCH
ON JIN-MERCHANT

晋商
研究

2008年第1辑 总第1辑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商研究/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096 - 0213 - 3

I. 晋… II. 山… III. 商业史—研究—山西省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386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杜 菲

责任编辑: 杜 菲

技术编辑: 晓 成

责任校对: 郭红生

787mm × 1092mm/16

15 印张

282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书号: ISBN 978 - 7 - 5096 - 0213 - 3/F · 209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主办：

山西财经大学

承办：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学术顾问：

孔祥毅 张正明

编委会主任：

杨怀恩 原梅生

编 委：

樊而峻 郭泽光 赵国浩 崔满红 王 森
黄鉴晖 葛贤慧 武三林 阎应福 孙长青
张亚兰 王永亮 乔 南 陶宏伟

总 编：

崔满红

编辑部主任：

王永亮

编 辑：

陈 啸 薛秀艳 杨志勇 侯海燕

地 址：

太原市坞城路 696 号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院《晋商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030006

电子信箱：jsy@ yahoo. com. cn

联系电话：(0351) 7666127

出版说明

山西财经大学有组织地开展晋商研究工作已有近 50 年的历史了。

为了及时反映国内外晋商研究的成果，早在 1982 年，原山西财经学院（山西财经大学前身）就创办了专门刊物《山西票号研究集》。1984 年，《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二辑出版。第二辑的“改刊启示”曾说明要从第三辑开始更名为《山西商人和票号研究》。遗憾的是，受种种条件限制，刊物只出了两集，更名一事也就搁浅了。

2004 年，山西省教育厅依托山西财经大学建立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2007 年，学校将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更名为晋商研究院。为便于学术交流，晋商研究院决定接承前辈意愿，恢复办刊事业，更名为《晋商研究》作为院刊。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晋商研究》是专门反映晋商与经济史、票号与金融史、晋商文化与商业伦理、中国商业文明流变、商帮史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

《晋商研究》以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界同人和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学生为主要目标读者，也愿意为商界、政界关心晋商和历史的士人竭诚服务。

恳请各界不吝赐稿！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晋商研究》编辑部

目 录

特 稿

- 晋商商帮溯源 孔祥毅/1
明清晋商与关公文化 张正明/26
会馆是商会的雏形 黄鉴晖/37

兴衰演替

- 开中制与明代晋商崛起研究 崔满红等/55
晋商的衰亡: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王 森/66

商业文化

- 晋商商会与晋商文化的发展 孔祥毅/81
极致与中庸:晋商文化的矛盾与统一 刘海鸿 郭玉兰/90
晋商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刍议 毛成刚/98

金融票号

- 山西票号的资本制度及资本管理 张丽云 郭 睿/104
山西票号本平制度之余平 杨青楠/112
晚清时期外国在华银行的发展变迁 刘 星/124

经营管理

- 晋商连锁经营的秘诀与启示 张亚兰/135
大德通票号的经营管理思想探讨 阎应福/142
清代山西商人经营行业研究 乔 南/167

比较研究

- 晋商与江右商的商业定位与经营观念比较 王智庆 刘建生/188
晋商与甬商兴起的客观原因比较 许 静/197

其 他

- 国民党政府时期“战时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陶宏伟/206
货币竞争与“铜货币区”的形成 张亚兰/214
晋商研究的冷思考 韩 玮/226

晋商商帮溯源

孔祥毅*

一、古代晋商

(一) 华夏商祖

现代商业行为，一般与市场关系密切，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中心。但是，在城市产生之前，商品交易与集市的活动已经开始了。据《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 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活动。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尧之治天下也……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枚，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用以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② 说明尧帝时已经有了简单的社会分工，生产品通过交换，互通有无。尧帝是中国最早的商品交换的组织者。“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③ 就是说舜作过农夫、渔夫、手工业者和小贩等。《史记索引》解释

* 孔祥毅，山西阳城人，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商业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原山西财经学院院长、山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商业部部级优秀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是金融理论与金融史、晋商与票号。

① 陈鼓应等：《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② 《淮南子·齐俗训》，《传世藏书》第2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

③ 《史记·五帝本纪》，《史记》3卷本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

“就时于负夏”时说：“就时犹逐时”，在贱的地方买，到贵的地方卖。可以说，舜帝是华夏商祖。“舜巡视天下，不幸死于道途，即‘葬南已之市’。”^① 城市的发展是沿着集市—街市—城市逐步演进的，简单的偶然的商品交换在交通方便的地方首先开始，时间长了、规模大了，就不再是日中为市，交易而退，而是就地盖房屋，形成街市；街市进一步发展，规模扩大，演变为城市。夏代，在夏都以及各部落活动的中心，平阳、蒲坂、安邑、夏县、翼城、垣曲等地，市场交易最为活跃。相传，夏县是黄帝妻子嫫祖出生地，她发明了育桑养蚕、缫丝织帛，并染成各种颜色，用来缝制衣物。考古学家曾在夏县西引村发现蚕茧化石，证明蚕丝在山西已有4000多年历史。^②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品交换发展。“据说夏朝的末代君主桀荒淫无度，竟然‘放虎于市，以观其惊’，拿百姓的性命当儿戏。难怪商汤兴师讨伐时，市上卖东西的人都抛弃自己的货物，纷纷出城投奔商汤。”^③ 这里可以看到夏朝的市，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了。需要指出的是，据历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山西。

（二）晋人铸币

实物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货币。从禹到夏代，是不是已经有了货币交换，没有考古的实物证明。不过《管子》说，“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也可能是一种推想。司马迁在《史记》说得比较客观：“农工商交易之路通，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④ 说虞舜、夏到商朝，货币是由多种金、布、刀、龟贝等物品扮演的，“及至秦”货币才得到统一。那么夏、商、周之间将近1800余年，就是商品交换对交易媒介物单一化的选择与淘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山西地区是走在最前面的。

商代，山西地区出现了不少城市，特别是封国和方国的封地中心，“比如今长治市西南、榆社、介休西南、太原南部、平陆县北、石楼县，都为商人们开辟了市场。此外，部落酋长的驻地和商王朝在山西统辖范围以外的周边部族，也是商人的贸易之地。他们用珠玉、饰品、食盐、织物、牲畜、毛皮以及奴隶等进行交易；酒不仅是当时社会上层不可缺少的饮料，而且也是社会下层普遍需求的商品。当时有所谓‘屠畜易酒’之说，这大

①③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通市》。

② 渠绍森：《山西与“丝绸之路”》，山西卫视农网，2006年8月10日。

④ 《史记》三卷本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

概指的是一般平民”。^① 今太原地区始终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叉地带，这对商品交换影响很大。由于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人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商人阶层，商业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物的物品种类由宽泛变得简约，当时，在今山西地区的交换媒介，有农具铲子，有打仗或自卫用的刀，有纺轮，也有来自海边的装饰品海贝，海贝数量不能满足需要，就用兽骨、玉石磨制骨贝、石贝，青铜出现以后，就用青铜仿制海贝。1971年，山西考古工作者在保德县林遮峪商代墓葬中发掘出铜贝109枚，海贝112枚，^② 证明商代在晋阳地区已经开始使用了铜铸币。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化程度提高，晋国经济富庶，手工业发达，很多农产品与手工业制品进入市场，加上汾河与黄河水上交通，商业空前繁荣。晋文公（公元前697～前628年）登基时，把百工和商贾纳入政府管理之列，使之成为官工和官商，即所谓“工商食官”，制定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政策，^③ 即减轻商税，除盗安民，商旅沿途往来安全。随着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工商食官”制度逐渐废弃，自由商人大批出现。《史记·赵世家》记载：上党“有城市邑十七”。在这些城邑里，一般“列市成行，店铺林立”，牲畜也在交易之列。^④ 在太原以北、以西地区，农牧相杂或以牧为主，以游牧狩猎为业的戎狄民族，不仅用牲畜和畜产品与晋国商人进行贸易，而且“贵货易土”，连他们赖以发展畜牧业的草地和宅圃，有时也用来同晋国商人交易，换取其所需物资。山西自古有“盐铁之饶”，凡经营盐铁的商人，都很快发迹。《国语·晋语》在提到这些巨富时曾这样记载：“夫晋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⑤ 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今洪洞）、平阳（今临汾）陈西贾秦、翟（指陕西和西北戎狄民族），北贾种、代（山西阳高和河北蔚县一带）。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自全晋之时……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温县）、軹（济源）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⑥ 可见山西已经成为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商品交换的枢纽。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以生产工具和其他实物作为媒介物越来越不方便，不易分割，不易携带，体积大，价值低，而铜的出现与

① 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

② 《文物》1972年第4期。

③ 《国语·晋语四》。

④ 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一辑。

⑤ 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

⑥ 《史记》三卷本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

运用，使商品交换的媒介物逐渐被青铜替代。前述 1971 年保德县林遮峪商代（公元前 1600 ~ 前 1100 年）墓葬铜贝出土，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比公元前 600 多年地中海地区一些国家铸币早 500 ~ 1000 年（公元前 700 ~ 前 600 年，小亚细亚和希腊铸造金银币，是西方铸币之始）。当时，古晋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在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内出土空首布的地方还清理出一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遗址，于大量铸造青铜器的陶范中还同时出土相当数量的空首布陶范和布首盃内的范芯，空首布陶范中以范芯尤多，如一个 4 米 × 4 米的发掘方中范芯的堆积厚达 60 厘米，据多年来积累所得范芯估计约有数 10 万件。有的布范内还留有尚未取出的空首布。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当时铸造空首布的规模与数量是相当庞大的。”^① 这显然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造币厂，比欧洲出土的公元后 3 世纪罗马铸币工场早 700 ~ 1000 年。

贝币从殷商至春秋初行用较多，并经历了从真贝到铜贝的演变过程。铜贝行用三四百年，东周初逐渐退出流通。侯马晋国遗址曾一次出土铜贝 1600 多枚，属东周初期货币。在古晋国出土春秋战国空首布的有太原、榆次、寿阳、侯马、运城、稷山等地；出土平首布的有太原、祁县、交城、汾阳、高平、阳高、原平、陵川、天镇、孟县、夏县、洪洞、朔县、襄汾、运城、屯留、代县、浮山、山阴、翼城、侯马、黎城、繁峙、怀仁、平陆、忻州、定襄、右玉、左云、灵丘、五台、忻县、万荣、永济、芮城等地；出土刀币的有交城、山阴、永济、高平、原平、朔县、孟县、浑源、神池、怀仁、右玉、左云等地；出土圆钱的有闻喜、侯马、翼城等。

（三）晋商北拓

公元前 201 年（汉高祖六年），为了防御匈奴南下，刘邦改太原郡为韩国，都城设在晋阳，封韩信为行王，坐镇北方。公元前 196 年，又把雁北和太原郡划在一起，称为代国，封他的儿子刘恒为代王，即后来的汉文帝。刘恒苦心经营，晋阳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北方商业中心，农业也很发达，手工业水平很高，能造耀眼夺目的钢镜、铁镜等商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太原郡“户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万四千八十八，县二十一”。虽然汉民族与匈奴时有战争发生，但因为地理关系，晋人出塞与匈奴进行贸易很频繁，多在边关进行，称为“关市”。《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② 聂翁壹“以财雄边”，他除经营大牧群外，还和匈奴进行走私贸易，聂翁壹的后人张辽，也与匈奴联系进行走私贸易，

^① 朱华：《三晋货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② 《二十五史》卷 1，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86 年。

通过边地贸易，为曹魏筹集军饷。除了“关市”以外，还有一种市易叫“军市”，即沿边驻军和军屯之地，都有小型市集。“汉发三将军屯北地，代屯勾注。”^① 勾注即雁门山，设有军市，通过商人贩运货物，补充军用物资。与北边游牧民族和边防驻军的贸易，始终是山西商贸发展的一个特点。

西汉以来，潞、泽栽桑养蚕、缫丝、织帛已很普遍，使山西得以用丝绸对外易货，除有少数山西商人经“丝绸之路”西去做丝绸买卖外，多半是西域商人来山西交易，间或有欧洲商人前来，各地多留有他们的足迹。《中国交通史料汇编》曾记有：“清末西人在山西霍州灵石县地方掘得罗马古铜钱十六枚。现钱面镌文，盖悉为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教皇帝时代所铸者也”，梯拜流斯为罗马第三代皇帝，时值我西汉末、东汉初年。当时，灵石为山西古代三大都会之一，是来往于晋阳、洛阳、长安之间的要冲。灵石出土外币说明那时外商是借“丝绸之路”之便而来到山西的。与此同时，北越长城，途经蒙古，到西伯利亚转欧洲的商路，成了当时东西方贸易的另一条“丝绸之路”的分支。这从西伯利亚和山西境内发掘的青铜器以及太原通往蒙、俄边境的路上挖掘出土的汉代漆器都可以得到证明。^② 两汉时期，除了盐铁及其他日用品外，粮食也经汾河、黄河漕运长安。《汉书》卷76载：“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③ 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城市商业管理已经显得十分重要。

西晋（265~316年）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前，战乱不停，冲击农耕，商业凋敝。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398年）以后，社会稳定，商品交换随着经济恢复与发展而趋于活跃，除与南朝通商外，还恢复陆上丝路贸易。随着佛教交流活动的发展而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一书中提到，在今吐鲁番、西宁、太原等地，均先后发现过4世纪以来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即为佐证。在北齐（550~577年），晋阳城是各地物资集散地，大量的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在此交易，与国内以至西域诸国都有贸易往来。当时，中亚、西亚人成群结队，络绎而来，在山西地区进行贸易。政府还设立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便利来华外商的生活和商务活动，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1999年7月9日，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掘了隋代虞弘墓，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考证，虞弘的祖先出自西域，从其父起就依附于一个柔然的部落，成为柔然手下的官员，曾出使波斯和吐谷浑，北齐时作为使节来到中原。不久柔然王朝被高车族灭亡后启用了他，随后又在北周、隋朝受到重用，临终前为隋朝的仪同三司，封

① 吕思勉：《秦汉史》。

② 渠绍森：《山西与“丝绸之路”》，山西卫视农网，2006年8月10日。

③ 《二十五史》卷1，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86年。

爵广兴县开国伯，食邑达到了600多户，59岁时卒于太原。虞弘在579年前后曾统领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专管入华西域人事务的机构，其首领多为粟特、突厥等胡人，由于职责特殊，萨保的身份非同一般，检校萨保府级别还要高于萨保，这就是虞弘。^①在虞弘墓出土地5公里外的太原市王家峰，有一位北齐将军徐显秀的墓，墓内壁画墓主人仪仗队中也有胡人形象。太原之所以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主要是晋阳向西与灵州相通，向南可达长安和洛阳，向北通漠北突厥，向东则可到达河北道重镇恒州和幽州。天然的地理优势，使山西地区成了民族融合的大舞台。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山西始终参与了与西域文明大交融，特别是素有“古代世界商贩”的中亚粟特人的络绎而至，带来了异域的物产、风俗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晋阳商业文化多民族融合的特点。

（四）粟据萌芽

581年杨坚灭周建立隋朝，封次子杨广为晋王，镇守太原郡，后来继承皇位称为隋炀帝。618年李渊父子灭隋，因李渊祖父李虎在南北朝时被北周封为唐公，李渊继承了这一爵位，故立国号为唐，太原是大唐帝国的发祥地，遂升为大总管府，领13县。690年改称“北都”，后改“北京”。唐王朝在晋阳不仅储备军用物资，还大修宫殿城池，形成了都城、东城、中城水上连城的北方最大的景观。晋阳规模宏伟，府库殷实，户丁雄盛，成为除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当时的晋阳交通四通八达，经济富庶，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是全国铸造货币的中心。铁制武器日臻完美，并州剪刀锋利无比，铁镜、铜镜盛誉全国，晋阳硝石、葡萄酒都是当时的贡品。《通典·边防》中《经行记》记载，唐人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751年（天宝十年）至西海（即地中海），在坦罗斯战役后被俘，在大食（今阿拉伯）共10年，后被释放，从海路回到广州。他到过该国的都城亚俱罗（即关德，今属伊拉克），看到“梭绢机杼”和“织络者河东人乐义懔、吕礼”。^②说明山西手工业者在8世纪就已在阿拉伯国家传授技艺。到唐玄宗天宝元年作为北京的太原，与京城长安、南京（成都府）、西京（凤翔府）、东京（河南府）合称五京。当时的太原府“领县十三，户十二万八千九百五，口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七十八”，太原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通典》卷7说：唐代开元年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中国民间的借贷活动发展到南北朝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办理借贷活动的信用机构，谓之“质店”。到唐朝出现“柜坊”、“僦柜”、“寄附铺”等

^① 中央电视台国际台“探索与发现”，2003年12月10日。

^② 《山西外贸志》。

信用机构，这些办理信用业务的机构多是兼营，还不是专业金融机构。山西人参与当时信用机构，比如存款于寺庙，《会昌解颐录·牛生》记载了柜坊的事：“牛生自河东赴举……至菩提寺……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绝不复来取。某年老，一朝湫至，便无所付，今尽以相遇。”^①晚唐晋中祁县人温庭筠（812～870年），在他的《乾溪子》中《扶风宝义（yi）》记载：“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义见辄与钱财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义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义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义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义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以直出钱市之。”^②

从907～979年的70多年间，并州古城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几个王朝，轮番占领，经济凋敝。960年，赵匡胤建立宋王朝，969年，派兵攻打北汉，979年，赵光义率兵攻取晋阳，放火焚烧晋阳城，第二年又引汾水灌了晋阳城废墟，先后几次将晋阳地区商民强迫迁往河南等地，很多人离开家园，失去土地，被迫走上了商途。

（五）宋元晋商

宋元时期，太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南北货物的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

宋代，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996年（宋太宗至道二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蕃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又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如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出藏绢两千余市马于岢岚。又诏三司出绢三万市马于府州（今陕西府谷）”。“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府二州界上，对渡之合河（兴县）、保德当冲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和市，以此为控御之道。互市以缯帛、纁绮，易驼、马、牛、羊、玉、氍毹、甘草；以香药、瓷漆器、蒺藜，易蜜腊、麝脐、毛褐獐、羚羊、硝沙、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著，听其民便。”^③

元代，帝国的疆域横跨亚欧，塞北通往欧洲的商路得以拓展，驿站完备，交通畅通，给山西商人发展以机遇。在喀喇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形成了很大的国际交易市场，以谷易马等相当活跃，有很多山西商人参与其间。^④对当时山西省内的工商业状况，《马可·波罗游记》有大量的描述，说太原府“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产葡萄酒及

①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

③ 康基田：《晋乘搜略》卷20。

④ 《论清代山西驼帮的对俄贸易》，《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

丝”，有商人远涉他国，“至印度通商谋利”。“离开太原府再西行七天，经过一个美丽的区域，这里有许多城市与要塞，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过了这个区域，到达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叫平阳府，城内同样有许多商人和手工艺工人。”^①

从上述可以看出，上古最早的商业活动从山西晋南萌芽，历经汉、唐、宋、元。山西商业发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其地处南部农业手工业生产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中间地带的优势，频繁的“茶马互市”，练就了晋人的商业意识与商业技术，也就是说，从事民族贸易是早期晋商就已经形成的突出特点，直到明清晋商仍然是借边贸崛起，这是山西商帮形成的历史根源和地理基础。但是限于早期商品市场发育的水平，那时的晋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商业制度、商业文化、商业理念，特别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行会组织。中国商业发展到明清时期，出现了商业革命，孕育了中国十大商帮，晋商得天时、地利与历史商业的积淀，成就了其称雄天下的辉煌。

二、明清晋商

明清两代，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辗转万里，纵横欧亚，开中国内地对外开放之先河。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②山西商人在商路、舞台、商业组织、企业制度、商业技术、商业文化、商业伦理等各方面均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成为最有影响的商帮。

（一）货通天下

关于明清山西商人与商业资本，笔者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当时“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扬帆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那里

^① 《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1982年。

^② 谢肇制：《五杂俎》。

酿造叫卖。他们自称，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①

清初，山西商人介休范永斗等八大皇商，接办了原来浙江商人海上对日本的贸易权，在18世纪往返于长江口与日本长崎之间，垄断从日本进口生铜的贸易80多年。晋商的海上商路（船帮）：国内各地—长江—吴淞口—黄海—日本长崎。但是晋商对外贸易路线的开辟，主要不在海上，而是对北亚和欧洲方向的陆路贸易。明代有东西商路，在长城内侧：北京—万全（张家口）—天成卫（天镇）—阳和卫（阳高）—大同一杀虎口—榆林卫—宁夏卫—宁夏中卫—凉州—肃州—敦煌—和田—叶尔羌—喀什噶尔—葱岭，进入阿拉伯地区。自清康熙初平定葛尔丹叛乱后，经由内外蒙古和新疆的对俄罗斯及欧洲的贸易进一步活跃起来，被称为“茶叶之路”：武夷山—铅山—九江—汉口—襄樊—社旗—清化—泽州—潞安—子洪口—太原—忻州—雁门关—黄花堡—西口（杀虎口）—归化—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或由库伦—科布多—古城—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西亚地区；或东口—多伦诺尔—齐齐哈尔—呼伦贝尔—满洲里。

由商路扩展开的晋商活跃的舞台更是广阔。首先是蒙古市场，在包头有民谚道：“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包头主要是山西祁县乔家商号发展起来的。在张家口有山西籍的皇商八大家，他们持有清政府发给的“龙票”，有到外蒙古的特许权，蒙古地区前营、后营，基本是晋商垄断贸易。在西北市场，晋商在宁夏、青海大做皮货、药材生意，民谚有“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在陕西、甘肃、新疆，奇台、古城、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叶尔羌都有晋商的足迹。现在新疆伊宁有一个祁县村，至今还说祁县话。在西南市场，晋商在四川做夏布、井盐、药材生意，自流井、巴塘、里塘、打箭炉、雅安都有山西人的商号。在贵州茅台镇，山西盐商汾阳郭氏于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参照汾酒技术，酿造出了至今中外驰名的茅台酒。在东北市场，前清时期晋商就在东北、朝鲜经营人参、夏布，在辽宁朝阳的太谷曹家有13行、640号、37000职工。呼伦贝尔的满洲里有晋商八大家占据市场。据1933年7月1日山海关报告显示，东北沦陷后有17万晋商返回山西，仅占在东北晋商的1/3。在东南市场，明代借食盐开中，晋商进入扬州经营淮盐，扬州瘦西湖、个园当年分别是临汾亢家、大同黄家的私家花园。晋商在福建武夷山包山收购茶叶，设厂加工，运销蒙古、俄罗斯。在中南市场，河南的开封、周口、洛阳、南阳、赊旗、朱仙镇等都有晋商修建的关帝庙，阳城商人在豫33县经商，徐沟商人张联辉在陈州组织军队配合清军镇压捻军，被赏穿黄马褂。九江、六安、羊楼司、羊楼洞是晋商茶叶采购基地。

^① 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与商业资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安徽卫视台专题节目“花戏楼”，就是借用了亳州晋商会馆舞台之名。在北京市场，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李华先生考察各地驻京会馆，其中明代晋商会馆占36%。新中国成立前晋商在北京垄断性行业有：米面行祁县人，纸张行临汾、襄临人，布匹行翼城人，干果行文水人，颜料行祁县人。现在北京的老字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当年都是晋商企业。在国外市场，晋商在朝鲜经营人参、夏布，在日本经营生铜贸易，在俄罗斯经营茶叶、绸缎，购进皮毛、呢绒、金属制品。俄罗斯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彼得堡等都有山西人。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从俄罗斯返回的山西汾阳商人有1万人。当时对俄贸易的主要市场恰克图、塔尔巴哈台、满洲里，基本是由晋商垄断。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仅恰克图市场输俄茶叶12万箱，价值1240万卢布，还有曲沃烟丝、晋城衣针、大同铜器、太原陈醋等。1844年，以恰克图为主的对俄进出口分别占当年中国进出口的16%和19%，占俄国对华贸易占其进出口的40%~60%。

晋商组织货通天下的同时，开辟了中国通往欧洲的陆路贸易路线——茶叶之路；开发了一批北疆城市诸如满洲里、朝阳、张家口、包头、定远营、西宁、科布多、恰克图等城市；创造了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如股份企业、两权分离、人力资本、联号制度以及资本管理、财务稽核等制度；创新了大量实用商业技术，如珠算算法、复式记账、本平记账货币、商业票据融资、拨兑转账、订卯清算，等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与晋商精神。

（二）汇通天下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世人皆知，晋商的当铺、钱庄（银号）、印局、票号、账局五大类金融机构，在全国以至国外进行金融活动，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注册就是“合盛元银行”。据1909年日本出版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记载：“汇票庄俗称票庄，总称是山西银行。据说在一百多年以前业已成立。主要从事中国国内的汇兑交易，执行地方银行的事务。”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①

当铺，是从事消费抵押信用的金融机构，在清康熙年间，全国有当铺

^①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